

进一步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强大思想武器

——学习《邓小平文选》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

刘道玉

《邓小平文选》的出版，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大事。我们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比较集中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以来，遵照党中央的部署，在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，作了大量的工作，因而使高教战线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。今天，在《邓小平文选》公开出版的时候，我们重温小平同志有关知识分子的科学论述，格外感到亲切，也格外深刻地体会到它的重要意义。

在文选中，不少篇目，象《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》、《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》、《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》、《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》和《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》以及其它文章的有关部分都系统地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科学论述。1977年，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空气。其后不久，他尖锐指出：发展科学和教育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，是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关键。他冲破禁区，推翻了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“两个估计”，并代表党中央重申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，是四化建设三支重要依靠力量之一，没有知识分子，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。小平同志的这些科学论述，不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，而且对我们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指导意义。

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是党的总方针、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它是党为实现其总任务而制订的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行动准则。从历史上看，在大部分时间内，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，执行知识分子政策，基本上也是正确的。但是，到了五十年代后期，我们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，逐步偏离了正确的方向，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种错误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。什么学校是“黑线专政”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，知识分子是“臭老九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等等。所有这些错误口号，都是从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的理论派生出来的。这个理论的核心是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，在党内还存在资产阶级，还存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，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。还认定，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，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的政，因而把斗争的锋芒对着了广大的知识分子。十年动乱期间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蹂躏，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受到了破坏，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了摧残。“文化革命”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，左倾错误的影响是深远的，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还必须作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。全会确定了“解放思想，开动脑筋，实事求是，团结一致向前看”的方针，^①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、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。在这一整套方针、路线的指引下，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拨

乱反正，认真清除过去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影响。

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是拨乱反正的一项艰巨任务。“两个估计”是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枷锁，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必须首先推翻“两个估计”的错误决定。早在1977年，小平同志就提出“‘两个估计’是不符合实际的。怎么能把几百万、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？”^②接着中央澄清了对知识分子“团结、教育、改造”方针上的混乱，指出：“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，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、教育、改造这个方针，现在已经不适用了。”^③通过拨乱反正，党中央制定了知识分子工作的正确方针、政策，这就是：“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。”^④“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、农民和知识分子。”^⑤对待知识分子，在政治上的一视同仁，工作上放手使用，生活上关心照顾。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，作了大量的工作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各级党组织认真复查了历史上和“文化革命”中知识分子中的冤、假、错案，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。从1978年起，恢复了技术职称的评定，截止1981年底，全国获讲师及相当讲师以上职称的就有100多万人；对20多万学非所用的科技人员调整了工作；有九万二千二百多名知识分子，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；从社会上，招聘了三万四千多名闲散的科技人员；从1980年到1981年底，全国解决了32万名知识分子的夫妻分居问题；重视了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，到1981年底，各类专业干部中，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；知识分子的住房和工资，也有了一定的改善。所有这些，使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，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，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，使他们心情舒畅、精神振奋地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这么说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已经完成了，甚至象少数人所说的那样，已经“过了头”呢？显然不是这样的。胡耀邦同志曾指出：“但是同时必须看到，无论在思想认识上，在社会舆论上，还是在各项政治、经济和组织措施上，都还远远没有彻底清除长期‘左’倾错误的严重影响。”^⑥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就在宣传知识和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声浪中，还有工程师被迫自杀；有些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竟受歧视、打击；有的“立案”考察，被靠边站；一些曾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，平反后安排了工作，个别有左倾思想的人认为，这是“右派翻天，右派掌权”；有些人心情不舒畅，要求出国出境，不少人去而不归；有些教师人身无安全，时有遭到辱骂、殴打和伤害的危险。这些都说明，我们党从指导思想完成了拨乱反正，但并不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；从总体而言，完成了拨乱反正，但并不是每一个具体单位都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。因此，在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中，还必须不断地排除阻力，甚至需要进行必要的斗争。

从工作上看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一般说，老年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好一些，中青年落实得差一些；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好一些，现实生活和工作条件问题解决得差一些；人才密度小的单位重视一些，知识分子多的单位差一些。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，既有思想认识问题，又有实际工作问题，但两者相比，显然前者是主要的。如果不是从根本上认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，不摆脱封建小生产者观念的束缚，不彻底清除轻视知识、轻视科学和教育，歧视知识分子的偏见和错误观念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全面的落实。

党的十二大，标志着历史性的伟大转变，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，就是要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，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。面临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形势，必须特别重视

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。靠什么来进一步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？一靠加强和改善政治思想工作，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；二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为他们分忧排难。当前，这两个任务，都还不能说作够了、作好了，还需继续努力。仅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言，已经和几年以前的形势不同了，现在不只是摘掉“四人帮”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帽子，而是要求更多了，范围更广了，有很多问题已经渗透到业务领域中去了。只有正确认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新形势、新特点、新任务，才能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我以为，在新形势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，应当抓好以下工作。

（一）重点要抓好中青年知识分子、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工作。

1957年，毛泽东同志曾估计，“各类知识分子，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，大约有五百万左右。”^⑦时隔二十六年，现在的知识分子队伍已有两千多万人，增长了四倍。到1981年底，我国有各种专业人才835万人，科技人才600万人，其中中年知识分子占60%。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建国后培养的，是又红又专的，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。这说明，广大的中年知识分子，不仅在数量上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主体；而且在质量上也是我国知识分子的精华，他们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。

前几年，我们重点抓了老年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工作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，对于发挥他们的专长，继承他们的学术事业，培养一代新才，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现在，我们还不能说对老年知识分子的政策已经落实够了，还要继续努力。但是，相比而言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年人身上还没有完全落实。有的反映说，“政策落实到了老年人的身上，担子压在中年人的肩上，入党落到了青年人的头上。”这话虽不能概括全貌，但在某些地区、某些单位确实存在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。当前，我们应当毫不迟疑地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放在中年人身上，这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在，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的。

当前，令人不安地看到，中年知识分子面临着教学、科研任务重，经济负担重，家务劳动重，工资收入低，健康状况差，发病率高，死亡率高的严重问题。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蒋筑英、罗健夫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，而不幸地过早地去世。据我校统计，从1981至1982年，就有十二位中年知识分子去世，平均年龄为47岁。有的说，“现在是白头发的给黑头发的送葬”。这种情景，怎么不使人痛心万分呢？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，都应当充分认识到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抓紧抓好。

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，最重要的是从速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问题。胡耀邦同志曾指出，“……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，把这看成‘基本建设’，并且是‘最基本的基本建设’。”基本建设是打基础的工作，是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的前提，不仅对当前，而且对长远都有重要的作用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为中年知识分子困难的呼吁已不少了，也作了不少工作，但是，问题解决得并不多，这里，可能涉及到一些关系影响到下决心，如知识分子与工人、农民的关系，中年知识分子与各层次年龄的知识分子关系，不同职业的中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，等等。但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中年知识分子的困难，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了，应当采取抢救措施，否则，不仅这几百万人将受到损伤，而且还会影响到几百万人才的培养。如果出现这种局面，其后果是严重的，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。

据了解，中年知识分子健康下降的主要原因，是两个不平衡、两个营养不足，即经济收入与支出不平衡，造成身体上的营养不足；业务知识的补充与输出不平衡，造成业务上的营养不足。前者，易为大家所看到，但后者并未引起有关方面注意。就拿大学来说，教学、科研、带研究生、编教材、协作攻关等，都是中年骨干教师挑重担。但是，现在知识更新很快，

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他们不得不加班加点，学习专业知识，学习新技术，提高外语水平。这就大大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，导致体质急剧下降。落实中年教师的政策，当务之急是：第一，尽快解决他们工资偏低的情况。在工资改革未实现以前，采取应急措施，发给适当的岗位津贴或生活补助。第二，要根据脑力劳动的特点，改善知识分子住房条件，提高其它所必需的物质待遇，为他们创造必需的工作条件。第三，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提高。对那些长期挑重担的人，有计划地安排他们进修，享受学术假，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业务上的补养。

青年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新鲜血液，是未来的希望，在重点落实中年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，也应当关心年轻的知识分子。他们有朝气，思想活跃，政治上要求进步，业务上要求提高，希望早出成果。我们不要看不起青年人，要注意发现人才，为经济振兴积蓄力量，培养第三代的学术领导人，使我国的科学事业后继有人。

（二）切实抓好知识分子队伍的管理。

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，而且还涉及到一些方针政策问题。邓小平同志曾指出：“所谓落实二十年的发展规划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第一位的就是落实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。这个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，应当抓紧解决，尽快解决。”^⑩

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，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。据统计，我国已有独立的科研机构5000多个，有科技人员600多万。从数量上看，同科技发达国家比较，相差无几。但是，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，还有较大的差距，科学研究的周期和科研成果的“物化”过程比较长。这里，除了原有科研基础和科研条件差以外，科技队伍管理不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人才的浪费，是最大的浪费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本位主义，部门所有制和统一分配、统一工资的制度造成的。目前的情况是，人才十分缺乏，但又浪费很大。

加强知识分子队伍的管理，其目的是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用在急需，用其所长。同人才管理有关的政策，重要的有人才的发现，人才的使用，人才的流动等。

我国人民素以勤劳智慧而著称，人才资源十分丰富。不是没有人才，而是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。人才的来源，应当广开才路。高等学校义不容辞地要输送大批人才，但是“社会大学”中，也会长出一批人才。一般说，学历的长短，反映受教育和知识积累的程度；但是无高深学历而自学成才者，也不乏其例。因此，选拔人才，既要重视学历又不唯学历论，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。当前，要特别重视落实自学成才、确有贡献这一部分人的政策，真正做到量才录用，论才付酬。

知人善任，学用一致，这是用人的一项政策。我国现在人才还很缺乏，应当优先保证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的完成，保证重大科技攻关的实施。但是，目前的情况并不是这样，有些部门人才成堆，而另一些部门人才严重缺乏，饥饱不匀。其原因，一是不尊重知识，不知获取知识的艰辛，更不懂知识再生产的效力；二是本位主义，宁肯积压浪费，也不愿支援别人。为了对口使用人才，应当作到三个平衡：一是作好人才预测规划，需要与培养的专业要力求平衡；二是局部与全局平衡，局部过剩的，应由全局调配使用；三是产业的转移与职业再教育要平衡。

人才的流动，是合理使用人才的关键。人才流动的目的有二：第一，克服学非所用、用非所长的弊端；第二，克服人才分布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。人才流动的方向，应当是由大城市向基层流，由内地向边远地区流，由人才密度大的向密度小的单位流。普遍反映，现在用人制度统得太死，用人单位没有自主权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的自由。人才流动，要有政策保证，同时要有权威部门管理。对于人才的流动，既能按需要集中使用，又要能按意愿合理流动，

作到统而不死，流而不乱。

（三）尊重知识分子的成果，鼓励上进，落实奖励政策。

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贡献，是通过知识的再生产，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来实现的。因此，尊重知识分子应当同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密切相联系。为了重视知识，鼓励发明，国家制订了《自然科学奖励条例》、《科学技术发明奖励条例》和《专利法》等。这对于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，促进“四化”建设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，都有重大的意义。

但是，在实际工作中，在对待知识分子成果和奖励上，往往还遇到不少的阻力。有些领导人，不是鼓励知识分子多出成果，多作贡献，而是动辄以个人主义、无组织无纪律等棒子，阻挠他们出成果。在校、厂协作中，有的需要时，把知识分子当作骨干，一旦成果和技术到了手，就把知识分子甩开。如果有了成果，要不榜上无名，或者当个陪衬。普遍反映，厂校协作，最后都是以学校吃亏而告终。

凡此种种，都涉及到对待知识分子成果的政策问题。脑力劳动，是比体力劳动更复杂、更艰辛的劳动。知识化的成果，一旦被采用，将比物质成果以更高的效益而起作用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不管是体力劳动或是脑力劳动，都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。宪法规定：“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，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”。“国家对于从事教育、科学、技术、文学、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，给以鼓励和帮助。”所有这些，都是国家对待知识分子成果的政策，我们应当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。

从知识分子政策检查情况看，存在的问题较多，还有很多政策没有落实。首先，要进行大力的宣传。“枪打出头鸟”是妨碍冒尖和创新的极有害的思想，也是“文化革命”左倾错误的流毒，必须彻底肃清。要鼓励冒尖，支持创新。对那些有贡献的人员，敢于冒尖的人，要表扬，要保护。要造成“树高要保护，才高受尊重”的良好社会风气。其次，要真正落实有贡献人员的政策，要克服平均主义，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。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，有重大贡献的人，在工资级别上可以跳级提升，在住房和工作条件上可以优先照顾，在晋升职称上可以破格提拔。这些政策，不仅是脑力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急需，也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切身利益的。

（四）贯彻“双百方针”，自由开展学术研究与讨论，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派。

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曾指出：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方针，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，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。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‘自由发展’，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‘自由争论。’”^⑩“双百”方针，是党中央确定的关于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，同时也是党对待从事科学和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政策。

“双百”方针，是在总结了国内外科学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。历史上最早的学派，是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国和古希腊时期。春秋末年，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孔子，积极进行办学、讲学、删诗、修《春秋》等活动，创立了儒家学派，对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十八世纪，正逢欧洲思想启蒙，新的学术团体风起云涌，使欧洲一跃成为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。在近代科学史上，以波尔为首的丹麦哥本哈根学派，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占主导地位。在1922到1932的十年中，该学派共有十位物理学家获诺贝尔奖金。从1946到1979年，美国共有一百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金，超过同时期全世界获奖者的一半。其原因是，学术自由民主，不讲资历讲才华。这些都说明，民主的学术空气，学派间的自由争鸣，是导致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。

另一方面，学术垄断、文化专制主义，对科学和文化的破坏，也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。苏

联“李森科学派”，就是一个学阀统治的伪科学集团。这个“学派”产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共统治了三十五年。在这一场“争论”中，有四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，二十九人被捕，二十五人被开除，以及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遭受不幸。李森科“学派”的教训在于：以政治口号代替学术观点；以伪造代替科学试验；以镇压代替民主讨论。这正是：胜利者不靠裁判，靠真理；失去了真理，只能诉诸武力。

在我国，“双百”方针提出后，曾产生过强烈的反响，对活跃学术思想，也起过短暂的作用。但是，在较长的时间内，“双百”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破坏。主要原因是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、过火的政治批判、反“修”防“修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等左倾错误造成的。在左倾错误思想统治期间，一家代替了百家，一“花”（样板戏）代替了百花，一种学术思想代替了各种的学术思想，“一言堂”代替了“群言堂”，致使我国文学艺术僵化，和世界科学技术相比拉大了差距。

贯彻“双百”方针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是紧密相联系的。“双百”方针遭破坏，知识分子就受迫害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党中央重申，“双百”方针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繁荣进步的根本保证，必须继续贯彻。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，我认为要贯彻“双百”方针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必须真正作到以下几点：第一，一定要划清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界限，不能无限上纲，动辄追动机，查根源，搞过火的政治批判。第二，在学术批评与反批评上，一定要对事不对人。对不同的学术观点，那怕是错误的，也不能围剿，抓住一点，不及其余。不能因人废言，也不能因言废人。第三，要允许个人有研究和争鸣的自由，“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”，^①以鼓励新的学术思想，支持创立新的学派。第四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对学术争论中的不同意见，不能用行政裁决，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，不要急于作结论。而绝对需要的是，通过科学实验，反复讨论和鉴别，以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。

（五）充分信任，积极培养，切实解决入党难的问题。

从历史上看，就知识分子总体而言，对社会的发展不仅起着精华的作用，而且起着先锋的作用。1939年，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了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》的决定，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，发展了革命的文化运动，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今天，我们面临“四化”建设，知识分子已是三支基本的社会力量之一。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把知识分子当作依靠力量，而且更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，使之成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，在“四化”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各地普遍重视了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，专业技术干部中，党员的比例有所增加。但是，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，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。当前，存在的问题是：对有名望的老专家注意得多，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关心得少；对已经工作的知识分子注意了，对大学生忽视了；等待条件成熟的多，积极培养的少。

为了加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，壮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力量，必须真正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：

第一，端正对知识分子的看法，真正作到一视同仁。虽然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已经明确指出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，但是仍然有些地方、有些单位、有些领导同志，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对立起来，认为知识分子可用不可信，知识分子入党多了，会改变党的性质。还有些共产党员认为，非党员知识分子担任领导工作，是放弃党的领导，对党不利。这些说明，在对待知识分子的看法上，还存在较严重的左倾思想影响。只有摘掉了有色眼镜，不再把他们当作异己，而当作知己，那么才能去关心他们，培养他们，把那些确实具备了党员条

件的，及时吸收到党内。

第二，必须划清一些政策界限，搬掉知识分子入党的拦路虎。从基层来看，在掌握条件上，感到困难的有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、个人政治历史等，这些被称为知识分子入党的拦路虎。有些老积极分子，已经考验了二三十年了，由于这些问题的影响，至今组织问题不能解决。其实，关于这些问题，党的政策界限历来是清楚的。这就是。家庭出身看本人，社会关系看影响，历史问题看现实表现。只要我们按照这些政策去作，敢于负责，所谓的“老大难”是可以解决的。

第三，正确看待知识分子的特点、缺点，防止求全责备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人，不可能是完人，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是正常的。同样的，知识分子由于工作的特点和环境的影响，形成了一些特殊的性格或弱点，如清高自负，孤傲寡群，生活散漫，等等。这些虽然也是弱点，但只要不影响工作，我们就不要求全责备。对待知识分子的缺点，要作具体分析，看是本质的或是非本质的，应当全面考察。不能只看一时一事，更不能因一时差错或不公正的评价，把一个确实优秀的分子拒之于党的大门之外。

（六）知人善任，大胆地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级领导工作。

在十年动乱期间，“四人帮”借批判“学而优则仕”、“读书作官”，破坏领导班子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建设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干部建设的方向，即实现干部的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。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同干部的“四化”是紧密相联系的，正确的路线决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。可以肯定地说，没有干部的“四化”，是绝对不可能有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。

近年来，在政府、企业的机构改革中，一批老干部主动让贤，退休、离休或退居第二线，一批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，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，使一些部门和单位呈现出朝气蓬勃的局面。在这方面，党中央、国务院起了模范作用，大大地推动了正在进行的机构改革。但是，目前的干部的状况，同四个现代化要求相差甚远，具有大学学历的比例非常小，知识化和专业化的程度也十分低。在实现干部的知识化的过程中，阻力还是很大的。有些地方，对于从知识分子中选拔领导干部，缺乏自觉性，只是慑于形势，急于找几个知识分子作陪衬；有些单位口径一致对外，抵制知识分子“掺沙子”；有些领导干部，不是选接班人，而是选代言人。同时，也还存在选人不当的情况，有的只看学历不看能力，只要职称不求称职，让一些有专长而无管理能力的教授或副教授担任领导工作，导致用人的浪费。

为了实现干部的知识化、专业化，必须大胆地、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各级领导工作。现在不是没有人才，而是缺乏相应的选拔人才的制度，一些有才华的人，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。怎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？我认为，应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；一是视野要广，选拔的范围要大。不能囿于本地区、本单位，要成千上万地推荐、选拔。知识分子是全党的财富，应当择优选拔，合理流动，统一安排。目前，在某些地方存在的划框框定调子的指名点人的方法，确不利于人才的发现。二是方法多样，渠道要通。人才为什么不能及时地发现呢？看来，主要的问题是渠道不通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那种仅仅依靠领导蹲点，单线联络，个别培养的办法，已显得不能满足需要了。选拔人才，是全党的事，不仅领导要抓，群众也要管；用人单位要挑，培养人的单位也要选；可以招考，也可毛遂自荐。这样，就会出现人人荐才，群雄逐鹿的生动局面。三是要制度化，建立客观的标准。制度化就是要使选拔干部的工作，有目的、有计划地进行，如干部的年龄、文化程度、任期、退休奖惩等，都要形成制度，不能因人而异。建立客观标准，就是使干部的条件规范化，避免直观的因素。（下转第19页）

